

结伙，打出“中国突厥斯坦”旗号，鼓吹“突厥民族”“高度自治”，从事“东突”分裂活动。<sup>1</sup>1945年随着国民党势力重返新疆，麦斯武德先就任新疆监察使，后一度出任新疆省主席，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阿勒甫金分别出任省府副主席、秘书长。正是这伙人在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奔走呼号，形成了麦斯武德—伊敏—艾沙为首的帮派，这就是新疆“东突”势力的由来。新中国建立后，麦斯武德1950年病故于乌鲁木齐家中，而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阿勒甫金则辗转流亡于土耳其，在那里建立了境外第一个“东突”活动的基地，后来的“世维会”头目艾尔肯·阿勒甫金（艾沙·阿勒甫金之子）、热比娅等则是他们的徒子徒孙。

## 【论 文】

#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史研究综述<sup>2</sup>

潘志平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剧变。统治12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4天，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苏联入境的六十多人的武装与巩哈游击队在伊宁发起暴动，经六天激战，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在台湾一般称为“伊宁事变”。至1945年夏，这个“共和国”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地区。1946年6月6日，伊犁、塔城、阿山暴动区人民代表与国民政府签订《和平条款》，并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三个地区已分别直接归属于省政府”<sup>3</sup>，虽然名义上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但这三地区仍处在武装割据之下，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自1930年代以来不断涌动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口号、纲领和行动的民族分裂运动。问题是，1944年的这个“共和国”复杂得多：一是，它一直与社会主义苏联有扯不清的关系；二是，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致电这个政府代表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sup>4</sup>。1950年以后，大陆的各种官方文献中称之为“三区革命”，而不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因此，很长时间内，至少在大陆学界，不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只有“三区革命”。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纪大椿在1980年撰文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是一个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甚至是不敢涉足的学术禁区”<sup>5</sup>，自纪大椿做上述表示之后，迄今又已过去三十多年，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sup>1</sup> 关于这一问题，将另文《东突厥斯坦运动与国民政府》专述。

<sup>2</sup> 本文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2014年10月号。

<sup>3</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页136。

<sup>4</sup> 《新疆三区革命史》页229。

<sup>5</sup> 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页112。



本文将就苏俄和中亚学者、西方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台湾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关于这个“共和国”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以探究有关这个“共和国”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同国家、地区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特点，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之处。

## 一、苏俄和中亚学者的研究

愈来愈多的史料证据都一再证明，苏联深深卷入这个“共和国”的事务，甚至可以说，没有苏联的政治的，特别是军事上的作用，这个“共和国”能否存在一天，都是个问题。因此，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一直为苏俄学者高度重视。

1960年代以前，苏联学者早期研究更多强调这场运动是“民主运动”（*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并力图与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电文相吻合。雅可夫列夫（А. Г. Яковлев）在“1944-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进入新疆的目的就是反苏，“三区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sup>[1]</sup>库特卢科夫（М. Кутлуков）的论文“1945-1947年南疆喀什地区人民民主运动”认为：南疆人民为了民主和自由与国民党政府开展斗争，并最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社会。<sup>[2]</sup>他的另一篇论文“1944-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说：“这一运动初期是带有民族主义以及力图把新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色彩……，只是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义的领导人逐渐开始明白与中国人民联合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立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苏联认为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3]</sup>敏古诺夫（Н. Н. Мингулов）的论文论题干脆就是“新疆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是整个1944-1949年革命的组成部分”。<sup>[4]</sup>以上苏联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立场，与当时苏中处于最美好的“蜜月”时代特征相适应。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此后，苏联学者则强调这场运动是“原住民”（*корен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的“民族解放运动”（*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如哈克木巴耶夫（А. А. Хакимбаев）的论文“20世纪30-40年代新疆原住民族解放运动”，其标题就说得非常清楚。<sup>[5]</sup>拉希莫夫（Т. Р. Рахимов）的论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中国新时期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地位”认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反对汉族统治者的民族运动”。<sup>[6]</sup>而曾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高级军官的祖龙太耶夫（Зунун Таипов）<sup>[7]</sup>，则著书《为自由而斗争》，公然提出，新疆要么应该像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样得到独立国家地位，要么就应该成为苏维埃联盟的

<sup>[1]</sup> А.Г.Яковл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народов Синьцзяна в 1944-1949 гг.*,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Кита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Т. XI. —(Москва: 1955),155-88.

<sup>[2]</sup> М.Кутлуко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Южного Синьцзяна (Кашгарии) в период 1945-1947 гг.*, Научные работ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АН УзССР. Кн. 1. —(Ташкент:1960), 20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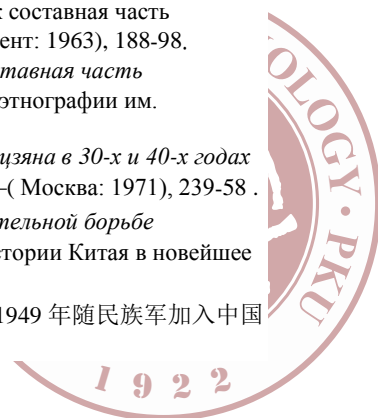
<sup>[3]</sup> М.Кутлук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1944-1949гг. В Синьцзяне как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итая.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 (Ташкент: 1963), 188-98.

<sup>[4]</sup> Н.Н.Мингул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Синьцзяна, как составная часть обще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44-1949 гг.)*,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Ч.Ч. Валиханова АН КазССР. Т. 15. — (Алма-Ата: 1962), 68-102.

<sup>[5]</sup> А.А.Хакимбае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орен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иньцзяна в 30-х и 40-х годах XX век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4 (120). —(Москва: 1971), 239-58.

<sup>[6]</sup> Т.Р.Рахимов, *Место Восточно-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народов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Втор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77), 68-70.

<sup>[7]</sup> 祖龙太耶夫(Зунун Таипов), 苏联国籍, 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副总指挥, 1949年随民族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少将衔, 1962年返回原籍苏联。



一个独立国家。<sup>[1]</sup>这一时间，苏联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完全服务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

在 1990 年代末，俄罗斯学者巴尔明（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出版了《苏中关系中的新疆（1941-1949）》，将 1940 年代的新疆放在苏中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北疆三区起义运动（*Восстание в Трёх северных округах*）”和“苏联对待‘三区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трёх округов*）的立场”成为这本书关注的主题。他首次引证了俄罗斯解密的一些档案资料，最重要的发现是，“今天我们可以肯定的说，1944~1945 年北疆三区起义运动的成功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苏联全方位的积极援助”。<sup>[2]</sup>虽然还未将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但无论如何是在利用苏联档案研究这一问题上开了一个好头。

历史研究经常要受到政治干扰，像“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样涉及到中苏关系中相当敏感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苏俄学界有关这个“共和国”不同时期的研究倾向，也正生动地反映苏俄在不同时期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中亚国家与新疆毗邻，这些国家学术界对“东突”问题也有一定的兴趣。哈萨克斯坦资深中国学学者瑟罗耶日金（К. Л. Сыроежкин）的《中国民族分离主义的幻梦与现实及中亚地区安全》是一部重要著作，他用“幻梦”（Мифы）来形容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旗帜的“东突厥斯坦”运动。<sup>[3]</sup>中亚国家学者一般将“东突厥斯坦”运动定性为“土著维吾尔民族”问题及其自决权相关的“民族解放运动”。<sup>[4]</sup>对此，瑟罗耶日金批评说：“这样做，学术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而政治上则是有害的”。<sup>[5]</sup>

##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195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不乏涉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拉提摩尔（Owen Lattimore）和贝洛夫（Max Beloff）的著作<sup>[6]</sup>，在论述苏联远东政策与新疆问题时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新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惠廷（Allen S. Whiting）与盛世才合著的《新疆：小卒还是轴心？》一书<sup>[7]</sup>，更多地站在盛世才的立场叙述伊宁暴动的背景及其与苏联的关系。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的《中国中亚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 年民国新疆政治史》<sup>[8]</sup>一书，是一部新疆近代史概论，这部著作对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第六章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鲍温德（Gardner Bovingdon）、杜磊（Dru C. Gladney）等美国学者为《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一书撰写的相关篇章，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东突厥斯坦”问题<sup>[9]</sup>。美国学者鲍大可（A. Doak Barnett）

<sup>[1]</sup> Зунун Таип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вободу*. (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74) .

<sup>[2]</sup> Валерий А. Бармин, *Синьц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1949гг.* (Барнаул: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84.

<sup>[3]</sup> К.Л.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ты: Дайк-Пресс,2003).

<sup>[4]</sup> Б. Бектурганова: “Уйгурский экзетизм”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Алматы: Компекс,2002).

<sup>[5]</sup> К.Л.Сыроежки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Китае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518.

<sup>[6]</sup> 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50); Max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sup>[7]</sup> Allen S. Whiting and Sheng Shih- 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sup>[8]</sup> 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3~228.

<sup>[9]</sup> 參見 S.Frederick Starr, ed.,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Armonk, NY; London: M. E. Sharpe, 2003) .

和泰勒（Christian Tyler）的著作也涉及到这一问题的研究。<sup>[1]</sup>以上这些美国学者主要关注点在于新疆当前的现实问题，“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问题是他们分析研究现实问题的背景陈述，在相关敏感问题的描述还是比较谨慎，因为不是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也就没有特别重要的发现。

事实上，在“东突厥斯坦”问题上有专门研究的西方学者是本森（Linda Benson），她在1990年出版的《伊犁叛乱：穆斯林对中国新疆政权的挑战？》<sup>[2]</sup>一书是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最具权威性的论著，她的基本观点是：“伊犁叛乱”是突厥穆斯林民族与外来的中国侵略者之间的冲突。她强调中国新疆当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暴虐统治的同时，并不重视苏联对这一事件的影响和作用。按照她在另一篇文章〈1940年代的维吾尔政治人物：伊敏、艾沙和麦斯武德〉<sup>[3]</sup>的说法，新疆地方民族的反抗运动受到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近代土耳其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本森还为文集《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撰写了第七章“新疆少数民族的教育和社会流动”，说道：“1915年土耳其的一些宣扬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突厥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流入新疆，它们主要宣扬泛突厥思想和泛伊斯兰思想”，“长期以来，一些富裕家庭，尤其是在新疆以西的穆斯林世界有亲属的，往往将自己的孩子送往穆斯林国家上大学”，“1944年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几位领导人，包括有非凡能力的阿合买提江在内，都在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的大学留过学”。<sup>[4]</sup>事实上，至1940年代“东突厥斯坦”运动领导人已明显地分化出亲苏与反苏两个政治派别，本森这里指出的是，这两派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

### 三、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纪大椿1980年撰写的“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sup>[5]</sup>，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开创者。纪先生潜心研究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三区革命斗争的功与过，都有苏联人的份”<sup>[6]</sup>。寥寥数语，份量可谓不轻。尽管当时有关的苏联档案还未解密，但其所做的研究并未过时，至今还不能忽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sup>[7]</sup>。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朱培民教授发表了“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后又收录在他的个人文集中。他认为，1943至1949年期间，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过三次变化：支持和策划“三区革命”，协助国民政府政治解决新疆问题，支持中共促成新疆和平解放<sup>[8]</sup>。新疆大学教授徐玉圻领衔主编的《新疆三区革命史》<sup>[9]</sup>，为

[1] 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3); Christian Tyler, *Wild West China: The Taming of Xinjiang*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3]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4] Linda Benson, "Uygur Politicians of the 1940s: Mehmet Emin Bugra, Isa Yusuf Alptekin and Mesut Sabri", *Central Asian Survey* 10, no.4(1991), 87-113.

[5] Linda Benson,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mong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92, 193, 194.

[6] 据纪大椿介绍，这篇论文初稿形成于1964年，1980年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要求完成内部文稿。1980年代在一些学术论坛中做过专题报告，文稿首次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五辑（内部刊物，1990），页1-11。

[7] 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五辑，页11。

[8] 原三区高级干部、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乌依古尔·沙伊然阅后对作者纪大椿表示，写得很好，就是那么一回事。

[9]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页87-99。后收入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页135-157。

[10]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新疆三区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第一部系统研究“三区革命”的史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等人合著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sup>[1]</sup>，虽然最近刚出版，但还是作者二十年前撰写的。这些研究成果代表大陆学界1990年代的研究水平，明显地突破过去竭力回避的一些问题，如苏联与三区革命间关系。也是这个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关于“双泛”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有：纪大椿的论文“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兼评分裂主义的旗号‘东突厥斯坦’”，系统论述了什么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什么是“东突厥斯坦”，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怎么传播到新疆来的。文中特别指出，1940年代“一方面是境外进来的用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起来宣扬‘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宣传品，一方面是当地赤裸裸的泛伊斯兰主义直接煽惑，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其危害是相当巨大的。”<sup>[2]</sup>；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大真主编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sup>[3]</sup>和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发仁主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sup>[4]</sup>，收录了新疆和内地一些学者的重要论文，是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集中清理。

1990年代末以来，新疆本地学者继续工作外，上海、北京、兰州等地大学、科研机构的学者从历史的、国际政治的和民族学的角度，积极参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内容和质量上更上一层楼。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sup>[5]</sup>，是研究“三区革命”与苏联问题极有份量的论文，这篇论文充分使用了苏联解密档案，非常有价值。沈志华将“三区革命”放在中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认为苏联对新疆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表示强硬，时而倾向缓和；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沈志华多年致力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对于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突厥斯坦斯坦共和国”的研究，贡献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的“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和“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认为，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迫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sup>[6]</sup>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黄建华的《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描绘了国民党势力1943年进入新疆后，与三区军事对峙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sup>[7]</sup>《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第四任主任厉声的重要著作，是一部新疆历史与现状的概述性著作，<sup>[8]</sup>第五章专门论述了“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其突破是除了使用了一些苏联解密档案外，还引证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关于苏联与三区革命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延琪、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等人关于“三区革命”

[1] 杜荣坤等，《新疆三区革命史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 纪大椿，“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兼评分裂主义的旗号‘东突厥斯坦’”，载《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页167。

[3] 冯大真主编，《〈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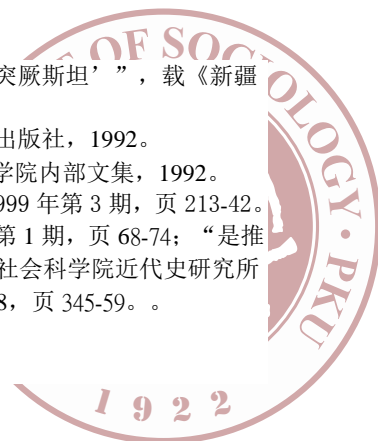
[4] 杨发仁主编，《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内部文集，1992。

[5]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页213-42。

[6] 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页68-74；“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页345-59。。

[7]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8] 厉声，《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161~187。



的专题论文，分别探讨了三区政府机构设置、军事斗争、农业生产发展等问题，对我们具体了解这个“共和国”政权的内部结构和军事和实业发展等细节问题有所帮助<sup>[1]</sup>。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主编的《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sup>[2]</sup>和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的《世界分裂主义论》<sup>[3]</sup>，则是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相关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理论著作。陈延琪、潘志平主编的《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sup>[4]</sup>、潘志平等著的《“东突”的历史与现状》<sup>[5]</sup>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第三任主任马大正等著的《“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sup>[6]</sup>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普及读物。杨恕等人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布）中央的一份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对苏联准备再度干涉新疆事务的企图做出分析，认为苏联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一系列变故的幕后策划者和支持者，可以确定苏联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新疆的关注，只不过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苏联的新疆政策有时明显、有时隐蔽罢了。<sup>[7]</sup>

毫无疑问的是，大陆学界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步。我以为，在大陆束缚这一问题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碍有：一，它与苏联的关系；二，毛泽东关于它“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评价；三，如实地评价（至少在它的初期）与分裂相伴随的民族仇杀活动。上述第一条已突破，而二三条仍是不大好直面的问题。

#### 四、台湾学者的研究

国民政府去台后相继出版了“外交部”、“国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有关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其中张大军自1950年代以来出版《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新疆动乱四十年》、《新疆伊宁事变与伪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及其溃灭》和十二卷本《新疆风暴七十年》<sup>[8]</sup>，既有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回忆，又收录了当年大量新疆历史档案，这些对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台湾方面的研究不甚多，但做得很认真、规范，如许秀蓉的研究，仔细地梳理了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谈判过程以及对新疆局势演变过程；再如吴启讷的研究，则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涉及民族关系问题放在“中国革命”和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讨论，还是独到见解的。<sup>[9]</sup>如吴启讷评论：台湾方面“仍大致倾向於将伊宁事变定位为苏联实现其吞并新疆野心的第一步。这种观点显然建立在1940年代后半期中华民国政府作为全中国主权的代表，以及国民党反共抗俄的意识形态这两个认知基础上。对待后来变节的张治中，台湾

<sup>[1]</sup> 陈延琪，“论新疆三区政府农业生产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页19-25；“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页89-97。杜瀚，“论新疆三区革命中的军事斗争”，《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页35-41。“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页34-44。

<sup>[2]</sup> 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sup>[3]</sup> 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

<sup>[4]</sup> 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sup>[5]</sup> 潘志平等，《“东突”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sup>[6]</sup> 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sup>[7]</sup> 杨恕、曹伟，“从哈共（布）中央的报告看苏联对中国新疆政策的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页141-46。

<sup>[8]</sup> 张大军，《新疆近四十年变乱纪略》，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四十年动乱新疆》，香港：亚洲出版社，1956；“新疆伊宁事变与伪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及其溃灭”，《新疆研究》，台北：文瑞印刷文具公司，1964，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丛书之二民国五十三年刊；《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

<sup>[9]</sup> 许秀蓉，“张治中与战后新疆局势之演变（民国34年-38年）”，《国史馆馆刊》复刊期22（1997年6月）页155~174。吴启讷，《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

研究者倾向于指责他在面对伊宁政权时，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背叛，出卖党国利益”。<sup>[1]</sup>的确，这些大体是站在国民党“党国利益”上的研究，可以理解，但新疆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毕竟不是“党国”的问题，我想台湾的同行会有新的认识的。

另外，在1950年代，国民政府高官朱家骅与流亡在土耳其的“东突”头目穆罕默德·伊敏（Muhammad Amin Bughra）有书信往来。朱家骅对这位多年的“友人”“有要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之意向”，“不胜惊异”，就其“所谓新疆问题”三次复函，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驳斥穆罕默德·伊敏独立的四点理由，义正辞严。<sup>[2]</sup>这生动地说明，“东突”之右翼穆罕默德·伊敏曾一度投靠国民政府，与“东突”之左翼，即以苏联为后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貌似对立，但分裂新疆的政治诉求是一致的，而中共与国民党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事上却是心心相印。

## 五、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

这主要包括王大刚和王柯的研究。他们都生长于新疆，有特殊的“新疆情结”，因此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拥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生长新疆的经历、背景，可就地搜集中国大陆，特别是新疆本土的相关第一手史料；二是身居海外，可广泛采集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重要档案、史料。此外，其研究环境也相对宽松。

旅居澳洲学者王大刚的《在苏维埃的阴影下：伊宁事变——一种族冲突和新疆国际竞争，1944-1949》<sup>[3]</sup>是一部优秀著作。他的基本观点是：“伊宁事变”，绝非单纯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也非单纯的中国内部事务，而是许多国际、族际复杂因素交叉互动的结果。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可表明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在1944年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王大刚认为，斯大林关于新疆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不可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须放在苏联亚洲政策中来考虑。当时，新疆汉族统治当局与地方民族长期的历史冲突正好为苏联扩大影响力并排斥英美日的影响，提供了绝佳时机，只不过国际政治现实不允许同时制造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制造“国中之国”反而更加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王大刚大量使用了第一手英文资料，如书目中提及的美国驻迪化和重庆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非常珍贵<sup>[4]</sup>。有评论说：王大刚关于苏联操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议，“就史料证据之坚强，可谓铁证如山”，同时也批评说：“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力量”。<sup>[5]</sup>但无论如何，王大刚的这部厚重的专著问世，大体扭转了学术界关于当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苏联关系语焉不详的研究状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sup>[6]</sup>是旅日学者王柯的研究成果。总的看来，王柯与王大刚分别独立完成各自的研究，但基本观点不谋而合。王柯的四个考察视角或许是他的重要创新：一、新疆地区社会及突厥伊斯兰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二、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内部结合原理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四、围绕着国际关系和国际

<sup>[1]</sup> 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7期，页166。

<sup>[2]</sup>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页668~695。

<sup>[3]</sup>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g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4]</sup> David D. 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476-85.

<sup>[5]</sup> 吴启讷，“新疆现代史研究述评”，页171。

<sup>[6]</sup> 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政治。<sup>[1]</sup> 这本书是他 1995 年日文出版的博士论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和民族问题》<sup>[2]</sup> 基础上的增补改写本。王柯近年来还发表了一些较高质量学术论文和著作<sup>[3]</sup>。这些论文中的一些创建性的观点和认识融入了这部增补版的著作之中。问题是，王柯的增补本易名为“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对 1930 年代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sup>[4]</sup>，只用了三页一笔而过，主要内容仍是 1940 年代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其实，1940 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并非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总统”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等人的活动，须注意的还有投靠国民政府的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 Sabri）、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三位先生”<sup>[5]</sup>，故此，易名反倒名实不符。此外，王柯之作对前人的成果吸收不足，如视而不见王大刚已公布的美国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难怪王大刚的“书评”就该书“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那本书，似有微词。<sup>[6]</sup>

## 六、小结

伊宁暴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成立，迄今已七十年整。有关这个“共和国”的研究总是不得不要受到种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和左右，或者说，这个“共和国”研究的本身就是政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政治因素淡化了，学术研究的空间得以扩张，许多问题能够得到科学的、更加符合实际的解释。比如，苏联方面当年是那么坚决地试图将自己与这个“共和国”的关系搞干净，而现在俄罗斯学者却能自由地利用解密档案寻求其中的真相。同样，关于这个“共和国”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学界曾长期被视为“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1980 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于这个“共和国”的研究有了相当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完全可以研究，但问题是，还需摆脱“阶级斗争观”的演绎，突破“革命史”研究的困境。台湾、海外华裔学者的研究，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政治包袱，相信今后会有更多贡献。西方研究可能会呈现多元态势，

[1] 王柯，“前言”，载《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頁 xv。

[2] 王柯，《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

[3] 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 年 2 月号，頁 40-53；“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頁 60-83；“‘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二十一世纪》2003 年 6 月号，頁 73-83。

[4] 1933 年，新疆大乱，4 月 12 日省城迪化爆发政变，结束了省主席金树仁的统治，握有军事实力的盛世才坐上了“新疆王”的宝座，但动乱仍在蔓延。甘肃马仲英部联合伊犁屯垦使张培元向省军发起围攻。正当盛马在北疆酣战中，穆罕默德·伊敏和田称王，接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喀什成立，它自 1933 年 11 月 12 日成立，至 1934 年 2 月 6 日被马仲英部攻灭，前后虽 87 天，但这是“东突厥斯坦”分裂运动在新疆首次付诸行动。

[5] 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Ehmetjan Qasim）在《同盟》杂志撰文谴责“三位先生和他们的集团”，其所谓的“三位先生”指的就是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穆罕默德·伊敏三人。参见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頁 87。这还有艾沙的“自述”为证，其中有他对麦斯武德说的一段话：“我们以‘三位先生’著称，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主义者都非常尊重您、伊敏先生和我”。参见 *Esir Doğu Türkistan İçin: İsa Yusuf Alptekin'in Mücadele Hatıraları*（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为了受奴役的东突厥斯坦》），Derleyen M. Ali Taşçı.（İstanbul：1985）481。

[6] 王大刚，“书评——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 年第 81 期，頁 207。



实证的客观的研究，可能会愈来愈多，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可以做成“分裂中国”的议题，也会引起某些学者的兴趣和兴奋。

同时还须看到，七十年前的这场“东突厥斯坦”运动，发生在与社会主义苏联一墙之隔的新疆伊犁地区，这是一个特别的地域——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多民族地区，一个特别的时代——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由此，这场民族主义暴动与社会主义苏联及本地的宗教势力发生复杂的互动、交集。正因为如此，不同立场、视角的研究者，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有较大差异，限于篇幅，有关这个“共和国”问题的争论、讨论将另文专述。今后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趋势可能是：一，随着各国诸方的档案不断开放、解密，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得以不断拓展，历史的细节问题必然搞得愈来愈清晰；二，随着政治干扰因素愈来愈淡化，研究成果愈来愈接近历史的“真相”，且愈来愈具有可信度；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作为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社会主义交集的标本，可能引起相关理论家的愈来愈浓厚兴趣。希望在不久将来，各国、各地区的相关学者能面对面地出席研究这个“共和国”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交流和切磋各自的研究心得。

## 【书 讯】

### 《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族源的角色》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米尔顿·M·戈登 (Milton M. Gordon) 著，马戎 译

译林出版社 2015 年 1 月

#### 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亚社会与亚文化

第三章 同化的性质

第四章 同化的理论：第一部分，导言与盎格鲁一致性

第五章 同化的理论：第二部分，熔炉

第六章 同化的理论：第三部分，文化多元主义

第七章 美国的亚社会与亚文化

第八章 族际关系的评估与可能的走向

## 译后记

米尔顿 M·戈登 (Milton M. Gordon) 出生于 1918 年，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 4 部著作：1964 年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年的《*Human nature, class, and ethni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主编的《*America as a multicultural society*》(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和 1988 年的《*The Scope of Soci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这 4 部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 1964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种族、宗教和民族来源的

